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第一輯

叢書主編

張柏春
孫顯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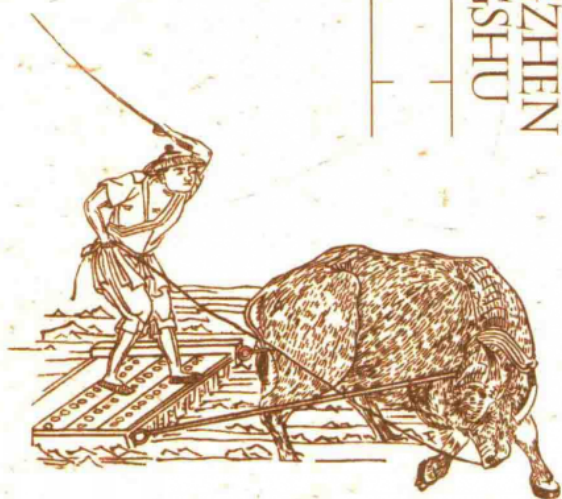
日本內閣文庫藏
明嘉靖九年刻本

王禎農書

【上】

WANGZHEN
NONGSHU

【元】王 禎◇撰 孫顯斌 攸興超◇點校



CIS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第一輯

叢書主編

張柏春
孫顯斌

日本內閣文庫藏
明嘉靖九年刻本

王禎農書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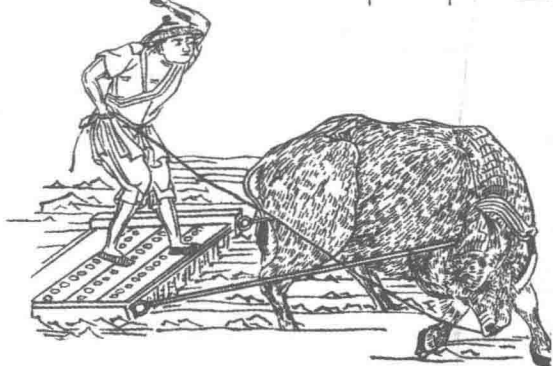
WANGZHEN
NONGSHU

【元】王 禎◇撰 孫顯斌 攸興超◇點校

國家重點出版物中長期規劃項目

二〇一一年—二〇二〇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CBS

K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王禎農書 (上、下冊) / [元] 王禎著; 孫顯斌, 攸興超點校
— 長沙: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4. 12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第一輯)

ISBN 978-7-5357-8549-7

I. ①王… II. ①王… ②孫… ③攸… III. ①農學—
中國—元代 IV. ①S-092. 4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4) 第 304858 號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第一輯)

王禎農書 (上、下冊)

撰 者: [元] 王 禎

點 校: 孫顯斌 攸興超

責任編輯: 徐 爲 楊 林

出版發行: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社 址: 長沙市湘雅路 276 號

<http://www.hnstp.com>

郵購聯係: 本社直銷科 0731-84375808

印 刷: 長沙瑞和印務有限公司

(印裝質量問題請直接與本廠聯係)

廠 址: 長沙市井灣路 4 號

郵 編: 410004

出版日期: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

開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張: 60.25

字 數: 650000

書 號: ISBN 978-7-5357-8549-7

定 價: 148.00 元 (上、下冊)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組織整理

叢書主編 張柏春 孫顯斌

編輯辦公室 孫顯斌 高峰 程占京

學術委員會 (按中文姓名拼音為序)

陳紅彥 (國家圖書館)

馮立昇 (清華大學圖書館)

郭書春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韓健平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韓琦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黃顯功 (上海圖書館)

雷恩 (Jurgen Renn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科學史研究所)

李雲 (北京大學圖書館)

林力娜 (Karine Chemla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

劉薈 (清華大學圖書館)

羅桂環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潘吉星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田森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徐鳳先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曾雄生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鄒大海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總序

我國有浩繁的科學技術文獻，整理這些文獻是科技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礎工作。竺可楨、李儼、錢寶琮、劉仙洲、錢臨照等我國科技史事業開拓者就是從解讀和整理科技文獻開始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科技史研究在我國開始建制化，相關文獻整理工作有了突破性進展，涌現出胡道靜的力作《夢溪筆談校證》。

改革開放以來，科技文獻的整理再次受到學術界和出版界的重視，這方面的出版物呈現系列化趨勢。巴蜀書社出版《中華文化要籍導讀叢書》（簡稱《導讀叢書》），如聞人軍的《考工記導讀》、傅維康的《黃帝內經導讀》、繆啓愉的《齊民要術導讀》、胡道靜的《夢溪筆談導讀》及潘吉星的《天工開物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與科技史專家合作，為一些科技文獻作注釋并譯成白話文，刊出《中國古代科技名著譯注叢書》（簡稱《譯注叢書》），包括程貞一和聞人軍的《周髀算經譯注》、聞人軍的《考工記譯注》、郭書春的《九章算術譯注》、繆啓愉的《東魯王氏農書譯注》、陸敬嚴和錢學英的《新儀象法要譯注》、潘吉星的《天工開物譯注》、李迪的《康熙幾暇格物編譯注》等。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組織上百位專家選擇并整理中國古代主要科技文獻，編成共約四千萬字的《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簡稱《通彙》）。它共影印五百四十一種書，分為綜合、數學、天文、物理、化學、地學、生物、農學、醫學、技術、索引等共十一卷（五十冊），分別由林文照、郭書春、薄樹人、戴念祖、郭正誼、唐錫仁、苟翠華、范楚玉、余瀛鰲、華覺明等科技史專家主編。編者為每種古文獻都撰寫了「提要」，概述文獻的作者、主要內容與版本等方面。自一九九三年起，《通彙》由河南教育出版社（今大象出版社）陸續出版，受到國內外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的歡迎。近些年來，國家立項支持《中華大典》數學典、天文典、理化典、生物典、農學典等類書性質的系列科技文獻整理工作。類書體例容易割裂原著的語境，這對史學研究來說多少有些遺憾。

總的來看，我國學者的工作以校勘、注釋、白話翻譯為主，也研究文獻的作者、版本和科技內容。例如，潘吉星將《天工開物校注及研究》分為上篇（研究）和下篇（校注），其中上篇包括時代背景，作者事迹，書的內容、刊行、版本、歷史地位和國際影響等方面。

《導讀叢書》、《譯注叢書》和《通彙》等為讀者提供了便于利用的經典文獻校注本和研究成果，也為科技史知識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不過，可能由於整理目標與出版成本等方面的限制，這些整理成果不同程度地留下了文獻版本方面的缺憾。《導讀叢書》、《譯注叢書》和其他校注本基本上不提供保持原著全貌的高清影印本，並且錄文時將繁體字改為簡體字，改變版式，還存在截圖、拼圖、換圖中漢字等現象。《通彙》的編者們儘量選用文獻的善本，但《通彙》的影印質量尚需提高。

歐美學者在整理和研究科技文獻方面起步早於我國。他們整理的經典文獻為科技史的各種專題與綜合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有些科技文獻整理工作被列為國家工程。例如，萊布尼茲(G. W. Leibniz)的手稿與論著的整理工作於一九〇七年在普魯士科學院與法國科學院聯合支持下展開，文獻內容包括數學、自然科學、技術、醫學、人文與社會科學，萊布尼茲所用語言有拉丁語、法語和其他語種。該項目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失去法國科學院的支持，但在普魯士科學院支持下繼續實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項目得到東德政府和西德政府的資助。迄今，這個跨世紀工程已經完成了五十五卷文獻的整理和出版，預計到二〇五五年全部結束。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際合作促進了中文科技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我國科技史專家與國外同行發揮各自的優勢，合作整理與研究《九章算術》、《黃帝內經素問》等文獻，並嘗試了新的方法。郭書春分別與法國科研中心林力娜(Karine Chemla)、美國紐約市立大學道本周(Joseph W. Dauben)和徐義保合作，先後校注成中法對照本《九章算術》(*Nine Chapters on the Art of Mathematics*, 11014)和中英對照本《九章算術》(*Nine Chapters on the Art of Mathematics*, 11014)。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與馬普學會科學史研究所的學者合作校注《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在提供高清影印本的同時，還刊出了相關研究專著《傳播與會通》。

按照傳統的說法，誰占有資料，誰就有學問，我國許多圖書館和檔案館都重「收藏」輕「服務」。在全球化與信息化的時代，國際科技史學者們越來越重視建設文獻平臺，整理、研究、出版與共享寶貴的科技文獻資源。德國馬普學會(Max Planck Gesellschaft)的科技史學家們提出「開放獲取」經典科技文獻整理計劃，以「文獻研究+原始文獻」的模式整理出版重要典籍。編者盡力選擇稀見的手稿和經典文獻的善本，向讀者提供展現原著作面貌的複製本和帶有校注的印刷體轉錄本，甚至還有與原著對應編排的英語譯文。同時，編者為每種典籍撰寫導言或獨立的學術專著，包含原著的內容分析、作者生平、成書與境及參考文獻等。

任何文獻校注都有不足，甚至引起對某些內容解讀的爭議。真正的史學研究者不會全盤輕信已有的校注本，而是要親自解讀原始文獻，希望看到完整的文獻原貌，並試圖發掘任何細節的學術價值。與國際同行的精品工作相比，我國的科技文獻整理與出版工作還可以精益求精，比如從所選版本截取局部圖文，甚至對所截取的內容加以「改善」，這種做法使文獻整理與研究的質量打了折扣。

實際上，科技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是一項難度較大的基礎工作，對整理者的學術功底要求較高。他們須在文字解讀方面下足夠的功夫，並且準確地辨析文本的科學技術內涵，瞭解文獻形成的歷史與境。顯然，文獻整理與學術研究相互支撐，研究決定著整理的質量。隨著研究的深入，整理的質量自然不斷完善。整理跨文化的文獻，最好借助國際合作的優勢。如果翻譯成英文，還須解決語言轉換的難

題，找到合適的以英語為母語的合作者。

在我國，科技文獻整理、研究與出版明顯滯後於其他歷史文獻，這與我國古代悠久燦爛的科技文明傳統不相稱。相對龐大的傳統科技遺產而言，已經系統整理的科技文獻不過是冰山一角。比如《中國科技典籍通彙》中的絕大部分文獻尚無校勘與注釋的整理成果，以往的校注工作集中在幾十種文獻，並且沒有配套影印高清晰的原著善本，有些整理工作存在重複或雷同的現象。近年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加大支持古籍整理和出版的力度，鼓勵科技文獻的整理工作。學者和出版家應該通力合作，借鑒國際上的經驗，高質量地推進科技文獻的整理與出版工作。

鑒於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承的需要，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策劃整理中國古代的經典科技文獻，並與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合作出版，向學界奉獻《中國科技典籍選刊》。非常榮幸這一工作得到圖書館界同仁的支持和肯定，他們的慷慨支持使我們倍受鼓舞。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等對「選刊」工作給予了鼎力支持，尤其是國家圖書館陳紅彥主任、上海圖書館黃顯功主任、清華大學圖書館馮立昇先生、劉薈女士以及北京大學圖書館李雲主任還慨允擔任本叢書學術委員會委員。我們有理由相信有科技史、古典文獻與圖書館學界的通力合作，《中國科技典籍選刊》一定能結出碩果。這項工作以科技史學術研究為基礎，選擇存世善本進行高清影印和錄文，加以標點、校勘和注釋，排版采用圖像與錄文、校釋文字對照的方式，便于閱讀與研究。另外，在書前撰寫學術性導言，供研究者和讀者參考。受我們學識與客觀條件所限，《中國科技典籍選刊》還有諸多缺憾，甚至存在謬誤，敬請方家不吝賜教。

我們相信，隨著學術研究和文獻出版工作的不斷進步，一定會有更多高水平的科技文獻整理成果問世。

張柏春 孫顯斌

於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基礎園區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目錄

導言 〇〇一

《王禎農書》點校 〇二七

《農桑通訣》 〇三三

《農器圖譜》 一五三

《穀譜》 七六三

附錄一 文淵閣本元王禎《農書原序》 九二七

附錄二 元戴表元《王伯善農書序》 九二八

附錄三 嘉靖本明閻閔《新刻東魯王氏農書序》 九二九

附錄四 章丘本明傅希摯《重刊東魯王氏農書敘》 九三一

附錄五 鄧渼本明鄧渼《重刻農書序》 簫曲山人鄧渼撰 九三二

附錄六 文淵閣本《王氏農書提要》 九三三

附錄七 閩本清孫星華《王禎農書跋》 九三四

附錄八 農專本民國郭葆琳《重刊王禎農書序》 九三五

附錄九 農專本民國張愷《題辭》 九三六

附錄十 農專本民國張寅生《王禎農書跋》 九三七

附錄十一 《王禎農書》書影 九三八

後記 九四九

導言

壹、王禎其人

王禎事跡在文獻中記錄不多，周郢發現與王禎相關的碑刻四通，十分重要。^{〔一〕}第一通為《東平府路宣慰張公登泰山記》，此碑立於元至元二年（一二六五），杜仁傑撰，碑題「奉高晚生王禎書并題額」。^{〔二〕}第二通為《王氏葬親碑》，此碑立於元至元四年（一二六七），杜仁傑撰，張志偉正書，王伯善八分額。^{〔三〕}第三通為《泰安重修宣聖廟記》，此碑立於元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東平府教授李謙撰文，文中稱「州教授王尹禎遣其門生劉琛馳書東平，請記其事。」第四通為《泰安重修靈派侯廟碑記》，此碑立於元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碑額下題「州教授王禎撰并書篆」。^{〔四〕}第一通碑題「奉高晚生」，奉高為泰安舊稱，則王禎應為泰安人。據《元史·地理志》，泰安州「元初屬東平路」：「（至元）五年析隸省部」。^{〔五〕}至元五年為一二六八年，元初在此之前稱王禎為東平人亦可，只是後世東平與泰安分立，則稱泰安人更為準確。王禎自稱「晚生」，意即元至元二年（一二六五）年紀尚輕。從后兩通看，王禎至少在元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即十年後已為泰安州教授，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仍在任，這與《乾隆》泰安府志》卷十《職官志》元泰安州教授下有王禎的記載相合。

〔一〕 邱樹森、周郢，農學家王禎生平事迹的重要發現，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九一年，第一期，九〇—九二頁。以及周郢，舊稿偶存：農學家王禎生平事蹟的重要發現，（二〇〇九年三月八日）〔二〇一四年二月一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3e6ba40100ch0s.html。

〔二〕 李正明、戴有奎主編《泰山石刻大全（一）》，齊魯書社，二〇〇〇年，七七—七八頁。

〔三〕 見法偉堂編《山左訪碑錄》卷一。

〔四〕 以上兩通見金榮編《嘉慶泰山志》卷十八《金石記·元明》。

〔五〕 宋濂等撰《元史》，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一三六九頁。

傳世文獻中最早的當屬元代戴表元寫的《王伯善農書序》，其文見本書附錄二，茲不贅錄，現將與王禎生平相關的內容摘錄如左：「丙申歲客宣城縣，聞旌德宰王君伯善，儒者也，而旌德治。」「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後六年，余以薦得官信州，伯善再調，來宰永豐。」另外，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王禎《農書》嘉靖九年刻本前有元代抄白，見本書卷首，茲不贅錄，內與王禎生平相關的內容如左：「承事郎信州路永豐縣尹王禎，東魯名儒，年高學博，南北游宦，涉歷有年。嘗著《農桑通訣》、《農器圖譜》及《穀譜》等書。」落款年月為「大德八年九月」。

由於王禎先後任旌德縣和永豐縣^(一)縣尹，所以在明清地方志中有零星記載，如：

《嘉靖》寧國府志卷五小注「有淳源橋，宋名平政，屢更修建，名亦數易，元元貞中縣令王禎始定今名。」卷七「旌德六門，東曰通和、英濟，南曰感化、明德，西曰廣豐，北曰迎恩。元貞元^(二)中縣令王禎建。」

《萬曆》寧國府志卷二《官師表上》載元王禎元貞元年任旌德縣尹。

《萬曆》旌德縣志卷七《官師志》載元「王禎，字伯善，東魯人，元貞元年任」云云。

清康熙年間顧嗣立編《元詩選》二集己集「王永豐禎」小傳曰：「禎字伯善，東平人。官旌德宰，六年再調永豐，山齋蕭然，終日清坐。每歲教民種桑若干株，凡麻苧禾黍牟麥之類，所以時藝芟穫，皆授之以方。又圖畫所為錢鎛耒耜耙耨諸雜用之器，使民為之。名其書曰《農器圖譜》、《農桑通訣》。…剡源戴表元稱其綱提目舉，華舉實聚。顧舊農書有南北異宜而古今異制者，此書歷歷可以通貫。信儒者之用世，非空言也。」^(三)全以戴表元書序為說，以王禎為東平人由此始，後世皆以東平為後世東平縣，而非元初東平路，遂多致誤。《萬曆》旌德縣志記載為「東魯人」，則泛稱無差。清代地方志對王禎的記載則多承《元詩選》小傳，如：

《康熙》江西通志卷六十三「王禎，字伯善，東平人。博通經史，清介自持。大德四年尹永豐，以課農興學為務，常買桑苗及木棉子導民分藝，遇旱或淫雨必齋戒虔禱，著有《農器圖譜》、《農桑通訣》，刻於廬陵，詩集一卷，名《農務集》。《元詩小傳》。」

《康熙》廣永豐縣志卷十八上「元：王禎：王禎字伯善，東平人，博通經史，清介自持。大德四年尹永豐，以課農興學為務，好禮儒士，誘之講業。嘗買桑苗及木綿子，導民分藝，遇旱或淫雨必齋戒虔禱。听夕憂民之凍餒，著有《農書》，刻於廬陵，豐士民久誦思之。」

(一) 此永豐縣為元信州路永豐縣（今江西省上饒市廣豐縣），與同時吉安路永豐縣同名（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明初信州路改為廣信府，清雍正九年（一七三一）改廣信府永豐縣為廣豐縣。

(二) 「貞元」應為「元貞」之誤。

(三) 顧嗣立編《元詩選》二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九〇三頁。

《乾隆》廣信府志》卷十「名宦」廣豐縣有王正，亦即王禎，避雍正諱改。小傳與《康熙》江西通志》略同。

《乾隆》旌德縣志》卷六《職官志》「政績」：「王禎，字伯善，東平人。元貞元年，以承事郎為縣尹。元王禎，字伯善，元貞元年以承事郎為縣尹。惠愛有為，凡學宮齋廡尊經閣及縣治壇廟橋道，捐俸改修，為諸紳士倡。蒞任六載，山齋蕭然。躬率家童於縣圃別為穀壟稻區，環植桑棗、木棉，凡麻苧禾黍牟麥之類，所以時藝芟獲，皆授之以方；又別為錢縛耒耜諸器，使民為之，名曰《農器圖譜》。《農桑通訣》，皆著有詩。又兼施醫藥，救民貧疾，種種善績，口碑載道。後調永豐。《省志名宦》《府志良吏》。」卷十《職官志》「祥瑞」：「元大德元年東魯王侯禎尹旌。」又「拾遺」：「元貞間，縣尹王禎，字伯善，山東東平人。治旌六載，每暇日躬率家童，辟廨西廢圃，構茅屋三間，引鹿飲泉水，注為清池，以種蓮芡，四面樹以花草竹木，仍別為穀壟稻區，環植桑棗、木棉，示民種藝之法，扁其居曰山莊，命其圃曰偕樂。又嘗教民種桑麻苧禾黍牟麥之類，并圖畫所為錢縛耒耜諸器，使民為之，名其書曰《農器圖譜》、《農桑通訣》，每物詠詩一首。」

《乾隆》旌德縣志》對王禎治縣與日常農耕生活記載略有拓展，而重要信息大體不出戴表元書序範圍。

關於王禎在旌德和永豐的任職年限，《萬曆》寧國府志》與《萬曆》旌德縣志》皆稱王禎於元貞元年（一二九五）任旌德縣尹，這與戴表元書序稱王禎丙申歲即元貞二年（一二九六）為旌德宰相合。《乾隆》旌德縣志》卷十《職官志》「祥瑞」：「元大德元年東魯王侯禎尹旌。」則大德元年（一二九七）王禎仍為旌德縣尹。戴序又稱「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後六年，余以薦得官信州，伯善再調，來宰永豐。」據袁楠《戴先生墓志銘》「大德甲辰，先生年六十一矣，會執政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秩滿授婺州，以疾辭。」戴表元《戴剡源先生自序》稱「大德丙午冬，歸自信州。」^{〔二〕}則戴氏信州教授任期為大德八年甲辰（一三〇四）至大德十年丙午（一三〇六）。從丙申歲算起「如是三年」即兩年後大德二年（一二九八），王禎仍任旌德縣尹，「後六年」正是大德八年戴氏出任信州教授。又《康熙》江西通志》、《康熙》廣永豐縣志》等記載王禎「大德四年尹永豐」，大德四年即一三〇〇年，《元詩選》小傳稱王禎「官旌德宰，六年再調永豐」，或以元貞元年推算，六年後正是大德四年。依戴序所述大德八年其任信州教授時王禎應還在永豐任上，王禎在《農器圖譜》所附《造活字印書法》中稱「予遷任信州永豐縣」，今知江西見行命工刊板」，是江西刻書時王禎應還在永豐縣任上，而元代刻書抄白落款為大德八年，與戴序相合。

王禎在元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仍任泰安州教授，之後至元貞元年（一二九五）近二十年間事跡沒有記載，元代刻書抄白稱王禎「南北游宦，涉歷有年。」或可以概括。王禎在《農書》中多次提及「江」、「淮」、「浙」、「中土」、「燕趙」、「秦晉」等地，一定程度

〔一〕李軍、辛夢霞校點《戴表元集》，吉林文史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五九二頁。

〔二〕李軍、辛夢霞校點《戴表元集》，吉林文史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一頁。

上是其「南北游宦」的寫照。按戴表元生于南宋淳祐四年（一二四四），卒於元至大三年（二二一〇），其書序稱王禎為「王君伯善」，則年輩大抵相仿，王禎至元二年（一二六五）自稱「晚生」，或與戴氏年紀相仿，二十歲余，到大德八年（一三〇四），則亦為六十歲余，刻書抄白稱王禎「年高學博」亦皆符節。四庫本《農書》前有王禎自序（見本書附錄一），落款為「皇慶癸丑三月望日東魯王禎書」，則皇慶二年癸丑（一三一三）王禎仍在世，以後事跡則湮沒無聞。

王禎除《農書》外，存世著述只有上文提到的《秦安重修靈派侯廟碑記》。另，王禎《農器圖譜》所附《造活字印書法》中稱「前任宣州旌德縣尹時，方撰《農書》，因其字數甚多，難於刊印，故尚已意，命匠創活字。二年而工畢，試印本縣志書，約計六萬餘字，不一月而百部齊成，一如刊板，使其知其可用。」是王禎還曾主持編撰並創木活字印《旌德縣志》，惜早已散佚不傳，其事在大德二年（一二九八）左右。

貳、《農書》的編撰及學術成就

王禎所撰《農書》分三個部分：《農桑通訣》、《農器圖譜》以及《穀譜》（四庫本系統稱《百穀譜》）。王禎在《農器圖譜》所附《造活字印書法》中稱「前任宣州旌德縣尹時，方撰《農書》，因其字數甚多，難於刊印，故尚已意，命匠創活字。二年而工畢，試印本縣志書，約計六萬餘字，不一月而百部齊成，一如刊板，使其知其可用。後二年，予遷任信州永豐縣，挈而之官。是《農書》方成，欲以活字嵌印。今知江西見行命工刊板，故且收貯，以待別用。」王禎大德四年調任永豐，那麼前二年即大德二年活字印《旌德縣志》畢，再前二年即元貞二年（一二九六）「方撰《農書》，意即王禎元貞元年任旌德縣尹不久就開始編撰《農書》。戴表元書序稱王禎「自永豐橐其書，曰《農器圖譜》、《農桑通訣》示余。」似乎戴氏看到的時候《穀譜》還未完成。根據王禎自稱原本計劃創製活字自印《農書》，所以向戴氏索序很可能和創製活字同時進行，其後因「知江西見行命工刊板」，所以就放棄自印。王禎自稱「予遷任信州永豐縣，∴是《農書》方成」，其遷任永豐在大德四年（一三〇〇），不知此時所稱《農書》是否包含《穀譜》。而元代刻書抄白已提到「嘗著《農桑通訣》、《農器圖譜》及《穀譜》等書」，則至遲元大德八年（一三〇四）今《農書》所含三部分已完成。

按戴表元序，《農器圖譜》、《農桑通訣》編撰早於《穀譜》。《農桑通訣》收穫篇第十一有小注「漚麻法見《穀譜》。」這種標注應為後加。《農桑通訣》小注多處標見《農器圖譜》，皆稱引為《農器譜》，而《穀譜》稱引有《農器圖譜》，亦有稱《農器譜》，《農器圖譜》又可以稱為《農器譜》。另，《農桑通訣》收穫篇第十一有小注「麥籠、麥綽、鈔刃並見《農具譜》。」此《農具譜》應指《農器圖譜》。《農器圖譜·續絮門》「木綿敘」有「夫種植之法，已載《穀譜》」。此處稱引在正文之中，「木綿敘」寫作很可能晚於《穀譜》，按前小注已出現稱引《穀譜》，抑或在完成階段三部分皆有補正，則互有稱引亦屬正常。唯獨不見稱引《農桑通訣》處，《農器圖譜·蠶繅門·蠶椽》有小注「為蠶因食葉上緣之蠶屑，不能透砂。事見《農桑要旨》」。此處《農桑要旨》似乎指《農桑通訣·蠶繅篇》。嘉靖本《農

器圖譜·田制門》後「授時之圖」其後有小注「此圖亦見《農書》，謂圖爲農器，故重出於此。」此圖重見於《農桑通訣·授時篇第一》前，則此處《農書》指《農桑通訣》。又《農器圖譜·利用門》「機碓」詩云「擬將要法爲圖譜，載入《農書·利用篇》。」《農器圖譜·鑿厝門》「鐵搭」賦云「願編圖譜，附銘也於《農書》。」《農書》則指《農器圖譜》，王禎在《造活字印書法》中即用《農書》總括，然而未見用《農書》稱《穀譜》處，抑或又爲《穀譜》晚成之一證。

綜上，王禎於旌德任上元貞二年（一二九六）開始編撰《農書》，先完成《農器圖譜》和《農桑通訣》，這兩部分至遲在調任永豐後大德四年（一二〇〇）就已完成，《穀譜》的完成至遲在大德八年（一二〇四）。

王禎《農書》的學術成就主要表现在三個方面：其一，於古代農書中首發南北農事之異，這一點戴表元就已經指出「閱之綱提目舉，華舉實聚，顧舊農書，有南北異宜而古今異制者，此書歷歷可以通貫。」其二，王禎從廣義的農具角度創立二十門，收錄農具百餘種，并輔以插圖三百余幅，編撰完成《農器圖譜》，是我國古代農具的集大成者，爲後世所宗。其三是對木活字印刷的實踐和記載，主要體現在《農器圖譜》後附《造活字印書法》，這篇文獻詳細介紹了王禎自己造木活字印刷的方法，尤其是韻輪排字和檢字法，是非常先進的；其中還記載了當時泥活字和錫活字的印刷實踐，是十分珍貴的史料。

王禎編撰《農書》，抄撮前人而誤抄暗引之處不少，如繆啟愉指出的「引文張冠李戴」、「引文割裂破碎，又揉合攙雜」、「撮抄前人不標明出處」等諸多問題^{〔一〕}。繆氏還對《農書》的資料來源作了較詳盡的核查，我們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大抵可知王禎採擷資料的來源以及編撰的體例。王禎總的編撰體例爲採擷諸書重新編寫，有的指出來源，有的直接編入正文，並且往往做了刪改，當然其中也有不少王禎自撰的部分。其主要利用了《齊民要術》、《農桑輯要》、《陳敷農書》、《太平御覽》等幾種典籍。

我們可以試分析一些篇章的構成以說明王禎編撰的體例。如《農桑通訣》卷首的「農事起本」開篇神農一段後輒引《周書》、《白虎通》以及《典語》，與《農桑輯要》「農功起本」全同，後敘后稷一段，則爲王禎自撰。「牛耕起本」中「三代以來」至「典禮實有關也」用周必大《曾氏農器譜題辭》^{〔二〕}中文字改寫。又「蠶事起本」中間引《易·系辭》一段來源於《農桑輯要》「蠶事起本」，其後引《禮記·月令》、《周官·天官·內宰》之文則來源於《太平御覽》卷八二五「蠶」條，今本《禮記·月令》無「享先蠶而躬桑」一句，證其從《太平御覽》轉引。又《農桑通訣·墾耕篇第四》前引《易大傳》、《周書》皆見《太平御覽》卷七八「炎帝神農氏」條，其中《周書》引文亦見《齊民要術·耕田第一》，但文字與《太平御覽》更相近。其後崔寔《四民月令》一段與「其林木大者」至「以火燒之」、「耕荒畢」至「爲穀田」、「《月令》」至「耕者少舍」等皆出自《齊民要術》，其後《韓氏直說》乃轉引《農桑輯要》，又有兩段引「《農書》」文

〔一〕繆啟愉《東魯王氏農書譯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九一—九五頁。

〔二〕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十四。

字基本同於《陳敷農書》。

《穀譜》「粟」前引「春秋說題辭」見《太平御覽》卷八四〇「粟」條，其後「齊民要術」曰「至「連雨則生耳」皆轉引自《農桑輯要》，順序小差。再後《周禮·地官》、「神農之教曰」、「史記」皆出自《太平御覽》卷八四〇「粟」條。又「芥」條：「葉似菘而有毛」至「色白如梁米」引《本草圖經》，「利九竅，明耳目，通中」引《神農本草經》，「芸薹芥不甚香，：比他芥不為甚佳」引自《本草衍義》。其後又引《齊民要術》。這裡只是一例，《穀譜》中引本草典籍頗多，除上述外，還有《食療本草》、《本草拾遺》等，推測王禎很可能轉引自《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此書在《政和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的基礎上又附上了《本草衍義》，囊括了王禎所引各種本草典籍。另外，王禎應該看到曾安止《禾譜》，《農器圖譜·耒耜門》「秧馬」就全篇引用了蘇軾《秧馬歌》并序，在《把杌門》「杌」條有「禾譜」字作憂。」曾安止《禾譜》五卷，於今只存零星段落，王禎《穀譜》是否闖入實難判斷。

實際上《農器圖譜》與其他兩部分的體例相似，只不過還多了插圖。《田制門》「耜田」引《詩》、《禮·月令》、《周禮·內宰》、《天官·甸師》等全出自《太平御覽》卷五三七「籍田」，順序小異而已。其後一段採編自《通典》卷四十六「籍田」，再引李蒙《耜田賦》出自《文苑英華》。種種跡象表明《農器圖譜》還參考了曾之謹《農器譜》。《耒耜門》「牛」條與上文所述《農桑通訣》「牛耕起本」都大段暗引周必大《曾氏農器譜題辭》。王禎在《錢鏵門》「薨鼓」還引用了「曾氏《薨鼓序》，又在《耒耜門》序中稱「仍以蘇文忠公所賦秧馬係之。又為《農器譜》之始。所有篇中名數，先後次序，一一用陳于左。」《農器圖譜》以《田制門》開篇，序言稱「《農器圖譜》首以「田制」命篇者」，《耒耜門》在其後，卻稱為《農器譜》之始，與《田制門》序自相矛盾，考慮到這裡稱「《農器譜》」而非《農器圖譜》，很可能此段序繼承了曾之謹《農器譜》文字。另外，關於王禎《農書》中引用「曾氏農書」的問題情況也很複雜，書中兩引「曾氏農書」與不少引用「農書」處都與《陳敷農書》文字略同，但篇名又差別較大；又有引「農書」文字不見於今傳王禎以前其他農書的，令人難以分辨。(二)據周必大《曾氏農器譜題辭》，曾之謹《農器譜》「凡耒耜、耨耨、車戽、蓑笠、銓刈、蓀蕒、杵臼、斗斛、金甌、倉庾，厥類惟十，附以雜記，勒成三卷。」是曾氏《農器譜》分為十門，王禎擴充為二十門。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又「續二卷」，則周必大寫序後，又有兩卷增補，具體內容則不得而知。又《農器圖譜·鑿耒門》序稱「又有鑿、鋤等器，雖畧見《犁譜》，終未詳備，乃復表出之，次於耒耜之後，就附鑿耒之內，庶無遺逸。」這裡所稱「《犁譜》」很可能是曾氏《農器譜》的「耒耜」部分，而「鑿、鋤等器」在曾氏譜中屬於「耒耜」，而王禎分而增「鑿耒門」。

《農器圖譜》還有不少引用樓璣《耕織圖詩》之處，對照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元程榮摹樓璣《耕織圖》與《農器圖譜》，可知王禎插

〔一〕參見曾雄生，《王禎農書》中的「曾氏農書」試探，中國農史，二〇〇四年第一期，六三一七六頁。

圖參考了《耕織圖》，如《耙杵門》「筮」與《耕織圖》「登場」，《倉廩門》「倉」與「人倉」，《蠶繅門》「繭甌」與「客繭」，《蠶桑門》「桑梯」與「採桑」，《織紉門》「經架」與「經」等，都可以明顯看出構圖上的繼承關係。^{〔一〕}

總之，王禎編撰的體例大體是一致的，雖然廣征博引，但是主要利用了幾種典籍，從而在不到八年的時間完成了《農書》的編撰。

參、《農書》的版本源流和影響

據嘉靖本元代刻書抄白，《農書》在元大德八年在江西首次刻印，然此刻本已不傳，元代是否有其他刻本不得而知。^{〔二〕}又據四庫本所附王禎《農書原序》，落款為元皇慶二年（一二三三）癸丑，這個本子與嘉靖本差別較大，應為元代另一版本，很可能以抄本傳世。明《文淵閣書目》卷十五「農圃」著錄有「農書一部十冊」，^{〔三〕}不知何本，這個本子很可能是後面永樂大典本的來源。我們今天能見到最早刻本即明嘉靖九年山東布政使司刻本，這個刻本在明代有過兩次翻刻，我們現在都能看到。到了乾隆時期纂修《四庫全書》，從明《永樂大典》里輯出一個本子，整理抄寫入《四庫全書》，於是《農書》的版本就有了另外一個系統。王禎《農書》的各種版本都托始於嘉靖本或四庫本，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王毓瑚依據四庫本系統的文字和嘉靖本的插圖點校整理出一個綜合新版本，於是就形成了三個版本系統。下面我們就按照年代順序分別介紹《農書》三個版本系統下的各種版本。

一、嘉靖本系統

（一）明嘉靖九年（二五三〇）山東布政使司刻本（簡稱：嘉靖本）

此次整理本書影即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該刻本。嘉靖本在國內外皆有收藏，南京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台灣「國家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日本靜嘉堂文庫、尊經閣文庫藏全帙，國家圖書館藏三個殘本，其中的一個殘本（索書號一三一九一九）只有《穀譜》十卷，與山東圖書館藏殘本存二十六卷皆有「濟南周氏藉書園印」，正可完整合璧。日本蓬左文庫藏一個殘本，存《農器圖譜》二十卷。美國燕京哈佛學社圖書館藏一個殘本，存《農器圖書》之部分。《中華再造善本·明代編·子部》所收王禎《農書》據南京圖書館藏本（簡稱：南圖本）影印。^{〔四〕}

〔一〕 參見史曉雷，王禎《農器圖譜》新探，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博士畢業論文，二〇一〇年，三三—三八頁。

〔二〕 《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七農家類著錄「農書二十二卷元王禎撰」下有「元本」，莫友芝可能根據戴表元序或王禎自序認為此書有元刻本，觀明代以來諸家著錄均無元刻本，此處僅為「知」而已。

〔三〕 楊士奇等編《文淵閣書目》，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二〇一頁。

〔四〕 此影印本缺「集之一」葉十三，「集之三」「鐵搭」、「杵」兩葉誤植「刻」後，「剝」、「梧桐角」一葉誤植「薺鼓」圖後。

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比較特殊，在書的最前面有一篇元代刻書抄白，而其他複本都沒有這篇抄白，代替的一篇明嘉靖九年閏閱《新刻東魯王氏農書序》（見附錄三），這篇序內閣文庫藏本卻沒有。各複本書後皆有一篇明山東布政使司刻書移文。通過對比內閣文庫藏本、南圖藏本和國圖藏本的裂版情況，我們發現內閣文庫藏本裂版處最少，有裂版處也最輕，茲舉一例：《農器圖譜集之二·耒耜門》「犁」最後半葉，南圖藏本從最右一行「耦」處向右「前後」、「耕夫」、「間」、「評」等處有一細裂紋，而國圖藏本裂紋更粗，然而內閣文庫藏本卻無裂版痕跡，由此可以判斷內閣文庫藏本至少是一個早期印本。我們再看元代抄白，此抄白中首列「皇帝」提行頂格，無疑保留了元代的面貌，但在明代山東布政使司所刻書中保留元代皇帝提行頂格顯然是不合適的，實際上書前用元代抄白也是不合適的。嘉靖本書中遇「國家」、「聖朝」、「皇」、「帝」等詞多提行頂格，不少為王禎自稱元代，如《農器圖譜·田制門·耜田》「欽惟聖朝，丕闡皇圖，講明典禮，開帝藉於京畿」，其中「聖朝」、「皇」、「帝」提行頂格，這應是元代本來面貌，書後刻書移文稱所據是一抄本，則此抄本不是元代抄本，就是從元代底本轉抄而來，因此嘉靖本應大體保留了《農書》元代的面貌，這是十分珍貴的。這樣元代抄白和閏序替換的問題就可以得到解釋了，嘉靖本忠實依照元代面貌刊刻，初印時忽略了元代抄白的政治性問題，其後發現即撤去元代抄白，而內閣文庫本的閏序不像是被抽去的，因為抽去行為的動機一般是想據元代抄白冒充元刻本，但書後移文有「嘉靖九年」落款，卻並沒被抽去。因此閏序很可能是後補上的，這樣的話結合裂版的情況，內閣文庫藏本很可能是嘉靖九年早期印本。除元代抄白和裂版外，各複本幾乎沒有差別。在整理過程中只發現一處內閣文庫藏本與南圖藏本不同，《穀譜集之五·韭》「瘦」[庾]郎一食二十七種」，「二」南圖藏本作「一」，國圖藏本亦作「二」，很可能印刷時「二」上面一橫脫墨所致。

根據書前閏序和書後移文，嘉靖本刻於嘉靖九年。全書三十六集〔一〕，其中《農桑通訣》六集，《農器圖譜》二十集，《穀譜》目錄存十一集，第十一集為「飲食類：幽七月詩說、食時五觀、備荒」，而正文只有十集，《備荒論》附第十集後，所以實際上總共三十六集。全書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行前空一字，四周單邊，白口，無魚尾。版心分三欄，上欄全書皆題「農桑通訣」；中欄題「集之」某，為全書冊號，共計十冊；下欄為每冊葉碼。

（二）明萬曆二年（一五七四）濟南府章丘縣刻本（簡稱：章丘本）

此刻本是嘉靖本的影刻本（書影見圖版一、二），書前有傅希摯《重刊東魯王氏農書敘》（見附錄四），接嘉靖本閏閱《新刻東魯王氏農書序》，書後與嘉靖本一樣有山東布政使司刻書移文，最後有「大明萬曆二載甲戌濟南府章丘縣刊行」的牌記。根據傳序和牌記可知

〔一〕《農桑通訣》目錄「集之二」下有雙行小注：「古之文字皆用竹帛，逮後漢始紙為疏，乃成卷軸，以其可以舒卷也。至五代後漢明宗長興二年，詔九經版行於世，俱作集冊。今宜改卷為集。」

章丘本刻於萬曆二年。全書分集、行款與嘉靖本同，版心同樣分三欄，上欄全書皆題「農桑通訣」；中欄題某「集之」，按六藝分全書為「禮樂射御書數」六冊；下欄為每冊葉碼。因為據嘉靖本影刻，所以文字基本一致，只是個別地方版式與嘉靖本小有差別，如《農桑通訣集之一·孝悌力田篇第三》「農者，被蒲茅，飯籩糲」，嘉靖本「飯」屬下行，此本比嘉靖本多刻一字，於「籩」字換行，到「以是耳」，國家累降詔條」，嘉靖本「是」屬下行，此本於「耳」字換行。

此本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上海博物館、日本岡山大學資源生物科學研究所所有藏，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一殘本，存《農桑通訣》六卷。

(三) 明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鄧漢刻本（簡稱：鄧漢本）

此本據嘉靖本重刊（書影見圖版三、四），前有鄧漢《重刻農書序》（見附錄五），據此序鄧漢本刻於萬曆四十五年。全書分三十六集，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四周單邊，白口，無魚尾。版心分三欄，上欄題「農書」某，為全書卷號；中欄題「農桑通訣」或「農器圖譜」或「穀譜」「集之」某，為每部分之集序號；下欄為葉碼與刻工，雜亂無序。此本刪去嘉靖本不少插圖，如卷首「農事起本」諸圖、「活字板韻輪圖」等。鄧漢本的文字與嘉靖本也差別不大，只是刪改較章丘本為多。

此本社科院考古所、江西圖書館、日本內閣文庫、東洋文庫、美國國會圖書館有藏。

(四) 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福建刻聚珍版叢書本（簡稱：閩本）

此本據嘉靖本重刊（書影見圖版八、九），前有「光緒乙未增刻」牌記，接閩闕序，再接四庫全書《農書》提要，然後目錄。書後有山東布政使司刻書移文以及孫星華跋（見附錄七）。據牌記與孫星華跋文閩本刻於光緒二十一年，又據跋文，所依底本為丁丙藏明嘉靖本，即今南京圖書館藏嘉靖本（有丁氏「善本書室」、「八千卷樓藏書籍」印）。全書分三十六卷，行款與聚珍本全同，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四周雙邊，白口，單黑魚尾。版心分三欄，上欄題「農書」，中欄題卷號及卷葉碼，下欄空白。孫星華在跋文中稱「悉心雙對，凡正誤字二千七百五十有四，補脫字九百四十，刪衍文八十有九。」可見他對嘉靖本做了詳細校勘，使閩本文字多有改動。

(五) 清廣東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廣雅書局刻聚珍版叢書本（簡稱：廣雅本）

此本據閩本影刻，刻於光緒二十五年，前有閩闕序，接目錄，目錄「農桑通訣一」下有「並圖」二字，閩本無。再接四庫全書《農書》提要。全書分三十六卷，行款與閩本全同，文字也基本一致。

嘉靖本系統相對簡單，除廣雅本直接以閩本為祖本外，其餘皆以嘉靖本為祖本，章丘本因為影刻嘉靖本，無論圖文行款都幾乎一致。

〔二〕《叢書集成新編》收錄影印此本，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五年，第四七冊。